

灾难事件发生时,人们会充分调动自己的潜能,保持一种亢奋状态以应对危机,等危机一过,某些应急状态下被忽视的心理问题就可能浮现出来。由此看来,因 SARS 流行病带来心理行为问题还不会在短期内消失,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心理咨询和辅导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市民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指数有了明显的抬升(5.76~6.34,达到 0.001 显著性水平),即市民们对北京经济未来发展的评价,已经从 1 个月之前的“需长时间恢复”发展为“短期能恢复,影响小”。这说明,经过 SARS 艰难时刻的北京市民,已经对政府控制措施的效果表现出了相当的认可,对经济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3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在 5 月 5~11 日进行的 SARS 疫情中,在北京各区县市民社会心理行为的调查基础上,于 5 月 27 日~6 月 7 日再次完成了对 15 个区县 582 名市民追踪调查。结果表明:

第一,随着北京市 SARS 疫情得以有效的控制,市民们的风险认知倾向已更为理性化,更加关注疫情能否被控制的信息。

第二,与市民的工作、生活环境等物理空间较临近的环境发生疫情的信息,更容易增加人们的风险认知(即警觉性),同样可能引起病毒传染的公共场所的发病信息,市民的风险评估要低得多。

第三,SARS 的病因、愈后的复发和感染等不可控制或不熟悉的因素,是民众可能增加心理恐慌的潜在因素。

第四,社会心理预警指标评估结果表明,北京市民的心理紧张度在迅速回落的大趋势下略有回升,心理健康水平自我评估的下降情况值得关注,市民们对于北京市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指数有了明显的抬升。

第五,SARS 等危机事件中人的社会心理行为的预测问题,更多涉及的是人的风险认知及其社会心理行为研究,它属于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健康心理学的范畴,研究对象涉及到从个体、群体、组织到大的社区领域,甚至是国家、民族水平的社会心理行为。此类研究工作在国外早已受到高度重视,如美国的 FBI、密西根大学的 ISR 社会调查研究所、兰德公司、英国的战略情报研究所等机构,都有大量心理科学供我们参与预警系统的科研工作。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如何建立国家级危机事件或重大事件的社会心理预警系统,使我国各级政府及与危机事件主管部门能及时监测个体、群体和社区,甚至整个大区域的民众的社会心理行为,从而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对策。它一方面可以预防因民众的行为不当带来的灾难,或者当危机事件发生后,立即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把损失控制到最小的程度;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舆论引导或心理辅导,帮助民众梳理各种复杂的信息,克服在危机事件中的恐慌,以便从容应对。这次社会心理预警指标在 SARS 疫情中的使用已经初步显现出对于危机事件管理重要的意义。我们基于这些研究结果,已经先后向政府部门和新闻界发布了 5 期《SARS 社会心理预警简报》,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目前,更为最重要的是,如何把针对 SARS 的社会心理预警指标这一特殊性的研究拓展到更具长远意义的我国危机事件和灾难事件“社会心理预警研究”之中。

组织防“非典”全国农村流动人口调查的做法和体会

王 谦(国务院防治

非典工作督察组成员、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财务司副司长)

为配合全国农村防“非典”工作,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紧急部署全国计划生育系统进行跨省流入农村地区人口调查,各县通过专用网站向国家上报数据。这项工作从设计、部署到收集各地的数据、向国务院领导提交分析报告,不到 6 天,其中专用网站的建设仅用了 3 天。从 5 月 13 日首次调查开始,各地每 3 天调查、上报跨省流入当地农村的流动人口信息(包括流入人数、流入时间、流出省份、以及流入人口的性别、年龄、户籍状况等),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农村地区的、快速有效的流动人口

调查、上报、分析系统,可以及时提供农村流动人口信息。这项工作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肯定,社会上的反响也很好。我作为这项工作的设计者、组织者之一,体会颇多,感慨颇深。我委从未组织过全国范围的流动人口调查,而且以往进行全国性调查,必须进行试调查,反复修改、完善调查方案和问卷,还必须对参加调查的人员进行严格的培训。这次调查时间紧迫且不允许各地人员聚集,既没有可能反复试验、修改方案,也没有可能组织培训。我们边设计、边部署、边实施、边获得成果、边收集意见、边改进完善。在这“六边”中,我们得到不少启示:

第一,计划生育系统的基层工作网络是其他任何部门所不及的。开展涉及全体人口的活动,必须深入到基层,接触到每个家庭。基层有140万村计划生育专干,8300万计划生育协会会员和计划生育中心户长。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在国家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我们能够及时把握人口信息特别是个案信息的变动。这次调查,全国除西藏外,其他省区各县均按时通过专用网站上报了数据,不仅及时,而且质量相当好。今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领域是非常广阔的。

第二,把握好“切入点”,有助于保证数据的质量。过去计划生育部门进行人口出生统计和考核,关系到地方官员的政绩,也直接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受到的干扰较大,数据“水分”比较大。这次调查农村流动人口,既关系百姓的利益,又影响着各级政府的决策,有关部门也急需,尽管调查工作任务急,在一些地方工作量还相当大,但各方面都支持调查,没有干扰。

第三,“不争论”,大胆地实践,用事实说话。搞如此大规模的调查,按惯例事先要反复商议,多方面征求意见。这次因为时间紧,也因为疫情不允许人员聚集,我们不可能开会商议,只能“六边”。过去一些事情只是议论,意见不统一就干不了,耽误了不少时间。其实,一件事情、一项工作,只要基本原则不错,基本方向正确,就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不争论”,先做起来,在做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或予以纠正。本次调查所采取的流动人口信息统计方法和管理原则已经议论了几年,但在实际工作中进展不大。这次疫情来了,没时间讨论了,我们真正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不争论”,做起来。实践的效果非常好,曾经有过的许多疑虑和担心其实并不会发生。

第四,要敢于打破常规。这次调查各县直接登录专用网站上报信息,从县到市、到省、到国家“0距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计划生育系统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甚至没有在局部地区试验过。这次调查为了抢时间,只有打破以往逐级上报数据的做法。这个网站有关的硬件设备在长沙,技术人员在长沙,由湖南省计生委信息中心建设、维护,我们在北京同样能看到数据上报情况,没有距离感,效果很好。我们还通过网站及时发布消息,解答各地的提问,各地反映非常好(少数地方一开始不了解、不适应)。这个专用网站的开通、使用,向全社会展示了计生系统一个全新的形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工作的高效率。由于要求通过专用网站上报数据,全国许多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信息化意识大大提高,信息化建设大大推进,真正是“以需求促发展”。

“非典”事件与中国社会转型

郑杭生 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研究中心教授)

今春爆发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其意义显然已经不局限于一种新型疾病的发现。由这种疾病而引发的社会反应可以看作一次非常事件,这一事件暴露了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一些深层问题,同时也启示了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1 “非典”事件凸现了全面推进社会转型的重要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非典事件反映出我国社会转型的不甚协调、不甚全面,由此启示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全面推进社会转型的重要性。